

会泽文化之旅

于克远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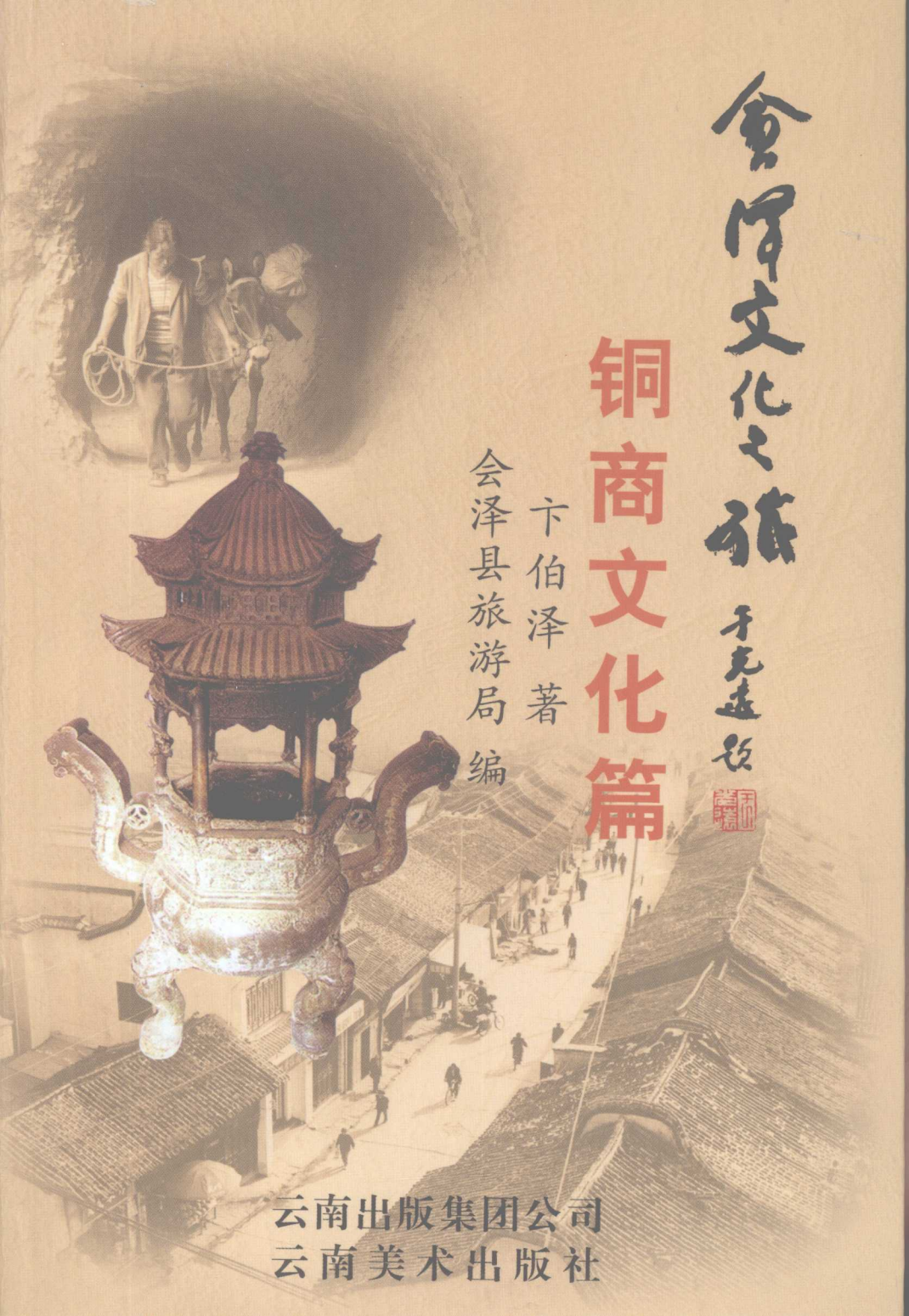


铜商文化篇

卞伯泽 著

会泽县旅游局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会泽文化之旅

# 铜商文化篇

卞伯泽 著

会泽县旅游局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泽文化之旅 / 卞伯泽, 杨德昌著; 会泽县旅游局编.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695-735-6  
I. 会… II. ①卞…②杨…③会… III. 文化史—会泽县  
IV. K2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538 号

---

责任编辑: 诸 芳  
封面设计: 万 言  
责任校对: 梁 红

编著本书所引用的图文资料, 未及与原作者一一联系, 在此诚表谢意!

## 会泽文化之旅

铜商文化篇	卞伯泽 著
铜马古道篇	杨德昌 著
民间音乐篇	会泽县旅游局 编

---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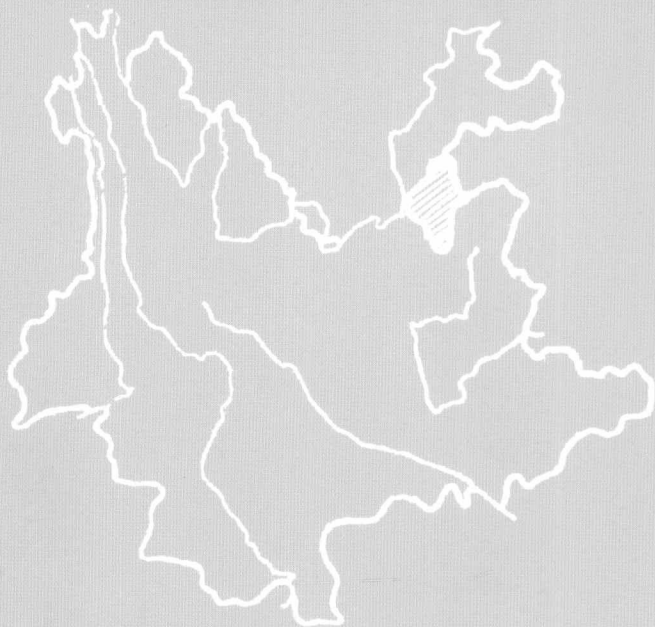
印 刷: 会泽红光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26.5  
字 数: 6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978-7-80695-735-6  
全套定价: 76.00 元(共三册)

书名题字：于光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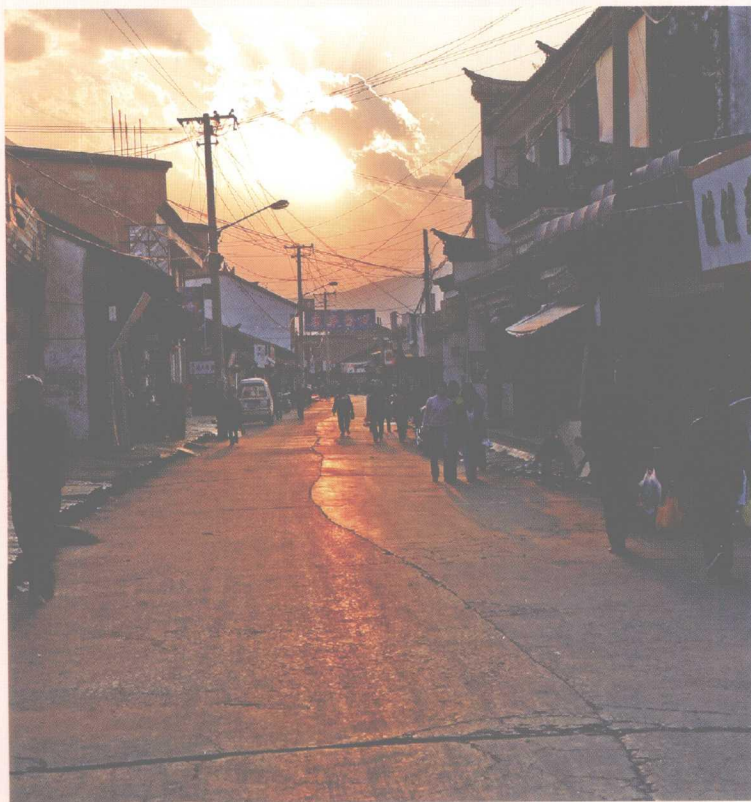
照片供稿：王怀刚 李永星

杨应彪 周朝祥

插图：周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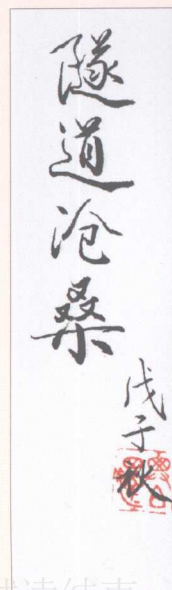






霞映名城

伯



隧道沧桑

戊子秋



夢幻銅都

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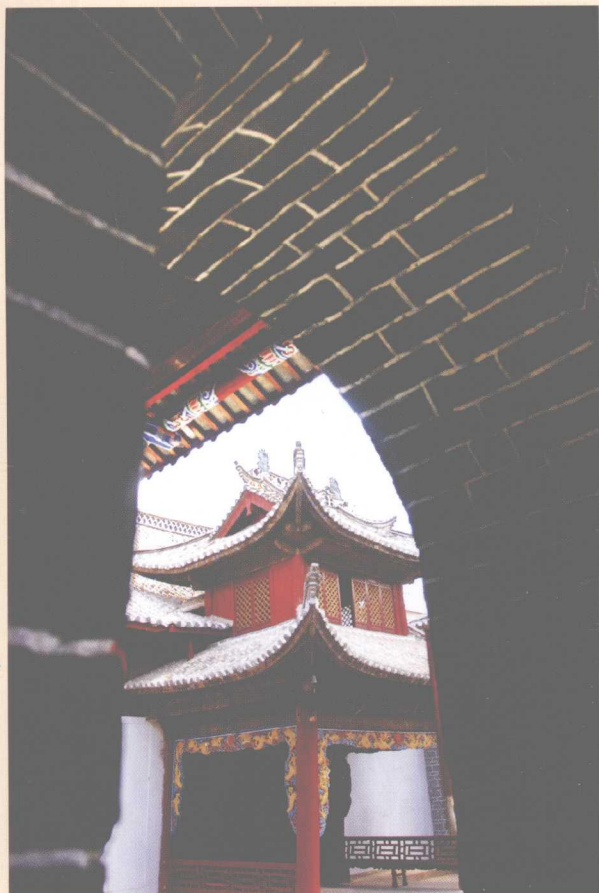


古道天涯

伯焯







月宮衛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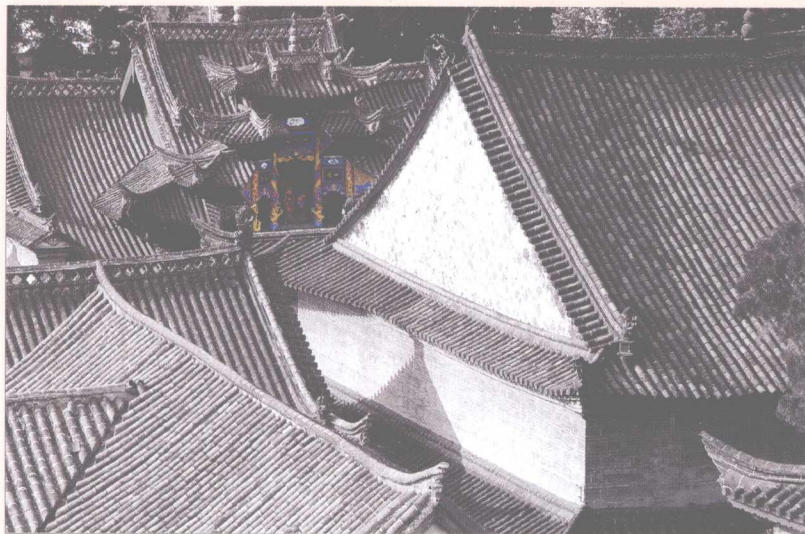
伯祥



銅都民居

戊子





會館林立

戊子秋  
錢

錢多古圖

伯





## 前 言

# 会泽文化之魂

中共会泽县委书记 何汝利

会泽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国宝

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因其独特性而具有普遍价值，如西藏唐卡、纳西古乐，作为一种独特资源，因其珍稀性成为多元的人类文化的一种，被学者视为难得的研究资料，以拓展思维空间，提升思维能力，服务社会。而游客为其好奇心驱使，前往观赏，又使之成为旅游资源。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具有十分广泛的人文价值。地域文化本身也会具有普遍性，成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如西安的古文化、洛阳的古文化、北京的古文化。它们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中国文化的代表，虽然属于某一地区，但人们不是将它看作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是视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作为能够代表一定时空一定族群的文化，当然很有价值，这就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有的地域文化，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特征都不明显。但是，有的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且特征鲜明。会泽的铜商文化就是这样。



所谓铜商文化,是指以铜为主的金属矿冶业的开采、冶炼、鼓铸及京运而形成的经济文化活动及其各种物质与精神的表现。铜商文化以铜为灵魂,形成了不同时期以古东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时空文化现象,其地域涵盖明清及其以前的东川府,乃至西汉时期的堂琅县,今天的会泽县、东川区、巧家县,一段时期还涵盖了今四川会理、会东、江舟、通安等县,是这一地域的人民共同创造的,为这一地域的人民所享有的一种特质文化。

会泽的铜商文化作为区域文化,是一部特殊的经济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是会泽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会泽因是古堂琅县及东川府治所所在地,对铜厂进行直接管理,铜本的发放、课税的征收、京铜的聚散、铸币厂的设立、各省采办铜斤和万里京运的起始,均在此地进行,具有铜商文化的代表性。自商代晚期开始,三千多年来,这种文化既有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砂丁)的广泛参与,又有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决策;既有封建社会省、府、州、县官吏的介入,又有中央工部、户部的廷议;既有土著居民的开采冶炼、锻打制皿,又有外省人的保驾护航、护送京运;既有中原汉族先进技艺的传播,又有彝族同胞原始技艺的传承,形成了广泛的创造主体。从商朝晚期堂琅铜矿原料外运河南安阳始,到清代中期东(川)铜的京运,应该说这种文化所产生的辐射空间,从边陲县城到京城,上下三千年,纵横一万里,形成了具有全省乃至全国意义的经济文化活动现象。会泽铜商文化,从采矿开始,到冶炼、鼓铸等工艺,器皿的锻打、制作以及鼓铸、京运各种制度的确立,加之交易、典藏等商贸活动,它实际已包含了文化学有关物

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进，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关注各自特殊的历史文化发展现象，探索基于自身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阐述历史的多样化、文化经济多种性，已成为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铜商文化作为会泽文化的主线，可以说是会泽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和灵魂，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几度辉煌，但这么多年，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发掘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也缺乏介绍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作为铜商文化发祥和辉煌之地的会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会泽，从早于欧洲 15 个世纪两晋时白铜的发明、进入世界吉尼斯之最的明代“嘉靖通宝”大钱币、生斑器皿及其制作工艺及清代东（川）铜万里京运，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唯一的；清代铜厂的数量、铸币局的设置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唯一的。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及艺术价值是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具有潜在的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的作者卞伯泽同志，从政协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会泽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方面，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用了两年时间铺叙成文，呈现了底蕴丰厚的会泽文化。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会泽的铜商文化，把散落埋没于会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珍珠”挖掘整理，连缀成串，形成会泽历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体系，其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该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对引发人们了解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助推会泽文化旅





## 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

游产业发展,宣传会泽、扩大会泽的知名度及影响力,使会泽的铜商文化作为云南的地域特色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 序 言

# 掘出会泽历史文化之“根”

郭 兴 良

这是伯泽探究会泽历史文化的第五本书。如果说他主编、撰著的前四本拾掇了会泽历史文化之“枝”、之“叶”，采撷了会泽历史文化之“花”、之“果”，甚至凿开了某些会泽历史文化之“核”，那么，本书可说是掘出了会泽历史文化之“根”。

我曾在《会文百家，泽润千载》(卜伯泽主编《会泽揽胜》序)中说：

“会泽历史文化”是一个不该被片面化和浅表化的系统。这个系统层面多而意蕴深，但最能凸显其特质的是它最辉煌的明清时期。那时的会泽，颇似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不妨称之为明清时代的“特区”吧。从这个系统的主要方面说：铜产业拉动的商业活动是其植根的经济土壤，来自内地不同省份的乡党网络是其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多地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生相容的多色调文化是其超凡的特质，种种物化的寺庙、会馆、民居、遗址以及非物化的民俗、语言、习惯、技艺等则是其载体。



十多年前酝酿、六年前改定的这个界说也许尚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铜产业及其拉动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即卞伯泽、尹正祥等对会泽历史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概言之的“铜商”,应该就是会泽历史文化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该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由此可见,会泽历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都应在“铜商”这个基础上来说明。

伯泽的《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追本溯源,集中论述了会泽历史文化之所以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深刻揭示出会泽历史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独特个性和魅力的根本原因,也从而找到了会泽历史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多样载体的源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说本书掘出了会泽历史文化之“根”。

从文本结构看,如果说伯泽前四本书写会泽历史文化之枝、之叶、之花、之果,犹如若干精彩镜头的“荟萃”,那么,本书则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虽总题为“铜商文化”,实则是由铜史、铜政、铜运、铜商、铜技、铜艺、铜趣等来建构的。

下面,我依此为序逐一作些解读。

铜史。作者从至少3200年前商代殷墟妇好墓中极有可



能有来自会泽的铜矿料，写到清代铜产业的鼎盛，通过大量文献和考古成果，认真梳理了会泽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业的悠久历史。其中战国时套头葬所用的铜釜，东汉时典雅华贵的洗盥用具“堂琅铜洗”，三国两晋时具有世界影响的白铜，五代时“采银太监坟”所标志的先进的银、铅、锌业，明代堪称世界古钱币之最并给会泽带来“钱王之乡”美誉的“嘉靖通宝”，清代历史空前、世所罕匹的东（川）铜“万里京运”、钱币鼓铸以及近代颇具资本主义经营特色的各种官办或民营的矿业公司，都是可圈可点的历史华章，也是会泽人民足堪自豪、值得历数的“家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法则让人敬畏。作者对会泽铜史的梳理，我认为至少有这样一些意义：第一，它说明会泽享有“天南铜都”、“钱王之乡”、“历史文化名城”等盛誉，当之无愧；第二，它丰富了会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使会泽的历史文化显得更加厚重；第三，它揭示了会泽文化个性以及会泽精神、会泽人性格气质的历史渊源；第四，它为研究夜郎文化、会泽矿业史、中国古代有色金属工艺史以及云南近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变革提供了历史线索和触发点；第五，它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为今人建设新会泽、开发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拓展了思路。

**铜政。**所谓“铜政”，指政府指导、治理铜业的一系列政策和管理铜业的各种政务。本书虽写到了几代王朝的铜政，但重点叙写的显得格外有光彩的是清代乾、嘉两朝给东川府这一“特区”施行的特殊优惠政策。经过雍正朝改土归流后的这片“新辟夷疆”，由于其特殊的矿产资源和对国家财



政金融的特殊贡献，清王朝对这个远离京都的“铜都”特别重视，不仅乾隆皇帝亲赐“灵裕九圉”的匾额，还特区特政、特事特办，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打破康熙朝“一两银子兑换铜钱一千文”的定制，给云南的兵饷银是“每银一两按一千二百文发给”的同时，又格外增加了东川府各铜厂的工本银，这就好比在对云南发放“边疆补贴”外，又特设了对会泽这个特区的“特区津贴”；不仅如此，还在原有 20 座铜炉的基础上，增加新炉 50 座，并都各加半卯鼓铸，实际上等于增发了工本银。此外，还把原来 20% 的课税降为 10% 的最低标准，更多地让利于“特区”。

至于在具体管理上，也是相当严密和规范的，无论预算、造报，还是各项费用的支领、还付，甚至鼓铸钱币时“上至每炉铜、铅所需数量，下至每盏灯油钱都有明确的规定”。

政策和策略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正是实行了这样的“铜政”，造就了乾嘉时期会泽铜业的空前鼎盛和辉煌。当时滇铜产量占全国铜产量的 84.18%，而东铜（会泽铜）产量占滇铜产量的 74.15%。换句话说即铜都会泽的铜产量占全国的 62%。

铜业的辉煌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当时矿区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 16 人骤增至 42 人；铜业的鼎盛也带来了会泽各行各业的空前繁荣。可以说，会泽历史文化的格局、特征和风貌，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由于铜资源的日益枯竭，生产技术的滞后，尤其是“官制铜政”这个不可克服的顽疾，使得会泽铜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逐渐走向了衰落。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源保护、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经济



规律等是何等重要，也即科学发展是何等重要。

**铜运。**会泽“关山万里运京铜”以其运程之遥远、运途之艰险、运量之巨大、运时之漫长、运力之广众、运制之完善、运景之壮阔，创制中国乃至世界的“今古奇观”。这一运，把铜都会泽与首都北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运，让边陲野邑会泽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这一运，运来了殊方异域多姿多彩的文化，让乌蒙山深处的会泽古城变得百媚千娇。可以说，没有这一运，便不会有会泽的这一“名”。

作者以宏阔的视野，论述了由外洋铜改用中国铜，进而改用滇铜、东(川)铜历史的必然，论述了由六关而三省而八省而两省而六省承办京铜的变化，具体叙写了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共185年东(川)铜京运的缘起、路线、运量、运期、运政、运规及其实际运作，尤其是因“运”而生的多如牛毛又锱铢必较的各种运费，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大大小小、巨细无遗地条叙缕述，让人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感受到了历史脉搏的跳动。

东铜京运是会泽历史文化中最具震撼力的华章，是会泽人民生命力彰显的典型。

那铜马古道上的声声驼铃虽已远逝，但先辈们的足迹却永远烙印在我们心上，也永远镌刻在会泽历史文化的册页里。

**铜商。**卞伯泽、尹正祥等长期致力于研究会泽历史文化的学者将会泽历史文化定位为“铜商文化”，卞著本书就是以此为题进行叙写和论述的。虽不能说以铜商文化一“言”就能“蔽”会泽深博厚重的全部历史文化，但从其“根”上